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改造：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基本方式及具体环节

元晋秋

[摘要] 不同于“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致力“解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首先致力“批判”，其基本方式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它以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副本”的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对象，以“描述”“揭露”为主要手段，目的是构建一种彻底的、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来推动“原本”之改造。其具体环节是：通过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学说的“描述”与“揭露”来发掘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进而在这一“历史路标”的指引下通过对原有理论的改造和新的理论的建构，最终构建出一种彻底的理论。这一理论通过掌握群众而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由此使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特质得以彰显、理论使命得以实现。

[关键词] 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路标

[作者简介] 元晋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广西 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22)04- 0042 -08

DOI:10.16524/j.45-1002.20220908.001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铭刻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碑上的这句名言不仅是马克思的独特身份标识，更是点睛其思想特质、彰显其理论使命的浓缩表达。那么，马克思是否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①换言之，马克思主要通过其理论活动（创立马克思主义）来改变世界。

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主流的阐释是将其概括为“两个发现”，恩格斯为这种阐释提供了权威注解^②。此处，我们无意背离，更非反对这种主流阐释，而是试图回到马克思理论探索活动的具体过程来发掘其基本方式，并致力于阐明这一基本方式的具体环节，以期为我们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第四卷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21BK5156）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②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又指出，马克思一生当中的这两个发现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546,601.

一、副本批判与副本选择：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不满“解释世界”而提出“改变世界”^①，不仅因为“解释世界”无力于实际状况之改变，更为重要的是，“解释”有滑落至“辩护”之巨大可能与风险。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指出的那样：“解释(归根到底)就是辩护；或者，知道一切就能原谅一切。”^②如果说“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首先致力“解释”，那么，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则首先致力“批判”。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之构想，提出“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③。那么，宣称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马克思是如何具体地展开他的理论活动的呢？

(一)副本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缘起及其特征

实际上，在给卢格写信的前几个月(1843年3月—9月)，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他的这种理论活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自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缘起于其在《莱茵报》时期(1842—1843年)所遭遇的“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④。具体而言，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当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⑤，其所彰显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是，国家是精神的主体，只有在国家理念的辩证分析中，现实的社会生活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在参与讨论社会现实利益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深切地意识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⑥，由此生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苦恼的疑问”^⑦，即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究竟是立足于国家观念，还是立足于那种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客观关系？

马克思试图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顾，这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黑格尔所使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成为马克思日后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经典原理的思想萌芽。与此同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彰显出马克思这种理论活动的鲜明特征：第一，这种理论活动展示为一种副本批判。如马克思所言，这里“首先不是联系原本”即联系德国的法和政治现状，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原因有二：其一，如果从原本即德国现状出发，即使采取正确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⑧；其二，对副本即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⑨。第二，批判所采取的手段是“描述”与“揭露”。如马克思所言，这种批判“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

①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关系的争论已久，争论的一方所秉持的观点可描述为“加总超越说”，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哲学的超越在于“改变世界”，但并不是不要“解释世界”，如国内学者黄树森、王东，国外学者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亨利·勒斐弗尔(Henri Lefebvre)等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与之相对的一方所秉持的观点可描述为“拒绝替代说”，如国内学者何中华提出，“改变世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它彻底地拒绝和摒弃了“解释世界”的哲学立场。以上提及的学者观点及出处可参见何中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补充还是超越？——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J]。天津社会科学，2019(3):11-22。笔者并非对这两种观点作出孰是孰非之评判，因而使用“马克思不满‘解释世界’而提出‘改变世界’”的表述。

②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4。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3。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⑨同⑤。

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它的主要感情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①。具体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描述”在这里直观地展示为对黑格尔相关表述的摘录及阐述，“揭露”则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之处，同时阐明其内在矛盾与不足。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正确地使用了‘外在必然性’”，“进一步发展了双重同一性中的一个方面”^②，“提出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③，“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④，等等。第三，副本批判的最终目标是原本改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言明，批判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作为“激情的头脑”和“武器”，批判要做的首先是“驳倒”“这种制度的精神”^⑤，此外还需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彻底的、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其最终要通向的是原本之改造——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因此，构建出一种彻底的、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成为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改造的重要环节。

（二）副本选择：从黑格尔法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线索

直观地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呈现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马克思在其中仅仅讨论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内法”部分第261~313节的相关内容，之后便很快地中断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继续讨论。但是，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看，讨论至此，“继续扎在黑格尔繁杂的法哲学体系中”^⑦已无必要，因为马克思已经得出明确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⑧。从黑格尔法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其以副本批判为鲜明特征的理论活动进程中所作出的选择，这种转向或选择当然可以归因于马克思在此时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但就理论活动本身而言，这里还蕴含着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深层线索：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底色，或曰，黑格尔法哲学即哲学化的政治经济学。

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在《黑格尔传》中将黑格尔描述为“一位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良好读者”^⑨，根据他的考证，青年黑格尔在伯尔尼做家庭教师时期，尽管有诸多的不如意，但雇主(冯·施泰格上尉)一家的私人图书馆为其提供了某种“补偿”，正是在这里，黑格尔“对不列颠经济学家特别是圣詹姆斯·斯图亚特可能同时还有亚当·斯密作了缜密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几乎立刻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⑩。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青年黑格尔》中也有类似的指认，他称黑格尔是“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⑪。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提出，正是“与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历史现实)的零距离接触，使黑格尔真正从神学(观念化)的理想天国开始回落到现实历史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上，从而使他的理性逻辑的进一步发生得以建立在欧洲历史现实发展的最高之点上”^⑫。张一兵认为，黑格尔完整地评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表述，就出现在《法哲学原理》一书里^⑬。实际上，将其涉猎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加以哲学化改造，以构建出一种近代社会的说明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

⑤同①.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⑦张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缘起及其发展逻辑[J].哲学研究，2021(6)：5-11,127.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⑨平卡德.黑格尔传[M].朱进东，朱天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07.

⑩平卡德.黑格尔传[M].朱进东，朱天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3-54.

⑪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M].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

⑫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67-68.

⑬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四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69.

理,正是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如韩立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将价值和货币概念改造成了‘物象本身’(die sache selbst)理论,将私人所有、分工与交换概念改造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将斯密的商业社会改造成‘需要的体系’”^①,等等。在此,如果说黑格尔用法哲学所包裹的秘密是政治经济学,那么,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转向政治经济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手段方法与目标指向

转向政治经济学伊始,马克思就立下宏愿,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巨著”^②,并随即在巴黎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自此之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始终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展开,由此使之成为并且鲜明地展示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直接地、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展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第四卷(又被称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被世人长期忽略,致使人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产生种种误解——此处,笔者试图在辨识中阐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见解。

(一)批判对象: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副本的政治经济学

何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就现有研究成果看,观点有三:一是将这种批判对象指认为政治经济学学说本身以外的某些对象,如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他对资本的批判^③、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④、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⑤的批判,等等;二是将这种批判对象明确指认为政治经济学,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反思对象的哲学批判程式^⑥;三是以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⑦。在我们看来,人们当然可以对政治经济学学说本身以外的某些对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其对象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学说本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对其批判对象的“副本”形式进行过指认,即其理论活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批判对象在这里非常明确,即作为当时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集中表述的黑格尔法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对其批判对象的“副本”形式的指认并未改变,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标志性理论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来加以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第一章的商品部分、第二章的价值尺度部分、流通手段、货币以及贵金属部分,集中展示的是马克思通过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学说的批判性研究所构建的原理或理论,主要体现为一种理论叙述。第一章商品部分之后的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第二章价值尺度之后的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历史以及后面的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集中展示的正是马克思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学说本身的批判或相关主题的理论批判史,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叙述^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之后,之所以决定以“资本论”为主标题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除了因为这部分所聚焦的内容是“资本”,还因为它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是精髓”^⑨;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被保留下来,这意味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批判

①韩立新.论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7-95.

②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1.

③陈学明.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J].哲学动态,2014(9):14-21.

④刘荣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阈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1):36-46.

⑤唐正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5-11.

⑥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J].中国社会科学,2015(1):4-22,202.

⑦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9-582.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在《资本论》中得到延续,其最直接最集中地展示就是马克思将其视为“艺术的整体”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部分”^①,即“理论史”^②部分的第四册(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在《资本论》第四卷中集中展示为包括詹姆斯·斯图亚特、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李嘉图之后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学说,此外还包括某些“社会主义著作家”的学说——因为“他们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斗争”^③。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概括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副本”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副本”的政治经济学,而非如费彻尔所说其中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虽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密切相关,然二者不应也不能混同;二是依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相关提示,副本批判只是手段,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对现存世界即原本改造——这里的现存世界或者说“原本”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它是马克思所要改造的对象;三是倘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那么,对它所进行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势必徒有其名,甚至可以断言,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无一例外地沦为对建立在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或正义的或人道的批判,这不过是在走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走过的老路。综上所述,我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表述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之“副本”的政治经济学。

(二)主要手段及方法:描述、揭露及其背后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的批判,既非康德哲学中以明确前提、划清边界为内涵之批判,亦非黑格尔将辩证法之批判性内隐于保守性当中之批判,更非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所进行的修辞学意义上的词句批判^④。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展示出的批判方式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描述”与“揭露”,这一主要手段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得到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其中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部分,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包括配第、布阿吉贝尔、本杰明·富兰克林、斯图亚特、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如何逐步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每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则致力“揭露”他们的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与缺陷。例如,马克思指出,在斯图亚特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有的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这是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但是,他的理论中充满了矛盾和缺陷,“他在一个地方说实在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同时又混乱地加上工资和原料”,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商品所包含的自然物质“叫作商品的内在价值”,而把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商品的使用价值”^⑤;又如,亚当·斯密在各种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他直接地宣布“劳动一般”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他在这里“完全没有看到自然要素”,一旦涉足交换价值领域,“自然要素却追跟着他”^⑥;再如,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但他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⑦。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描述”与“揭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0-231.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6.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

④杨楹,郭雅玲.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向度[J].中州学刊,2020(6):104-110.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1-452.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3.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4.

露”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改造和新的理论的建构,马克思才构建出了自己关于商品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部分得到了完整叙述^①。在此,如果说“描述”与“揭露”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主要手段,那么,唯物辩证法则是其背后所贯穿的核心方法。“描述”反映的是马克思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彰显的是其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并由此赋予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客观性原则;“揭露”则是在客观“描述”对象的过程中,立足于唯物史观,在历史进程中对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局限性(即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并凸显其被否定之必然性,由此赋予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辩证法之自我否定性原则。关于这一方法,恩格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有详细说明^②。

(三)目标指向:构建一种彻底的理论以推动“原本”之改造

费彻尔提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③很明显,在这里费彻尔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张雄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在场性原本不是单纯的对当下经济生活的范畴批判,而是一个与人类的生存境况、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经济解放运动,它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事件’,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④。其中的问题在于:对经济生活的范畴批判如何又是一个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经济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所谓揭秘性事件以及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承载和追求?实际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由此使他找到并确立起自己“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还在于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并且展示出来的其“批判”活动的鲜明特征:以“副本”为批判对象、以“描述”和“揭露”为主要手段、以“原本”改造为目标指向,构建出一种彻底的、能够掌握群众,进而能够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的理论。据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直接就是一个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经济解放运动,要承载如此使命,它至少需要通过副本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彻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建立在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揭秘”才能完成。这种彻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通过掌握群众而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如此,所谓的“经济解放运动”“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概括为构建一种彻底的理论以推动“原本”之改造。

三、描述与揭露、改造与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环节

作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具体环节展示在马克思“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这里的所谓“完整”,一是强调《资本论》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联系。作为后者的“续篇”^⑤,《资本论》不仅在内容上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接着写”,在结构和形式上也延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风格,即理论(原理)部分与历史部分的统一、理论叙述与历史叙述的统一。二是强调《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⑥,作为其中的历史叙述部分、理论批判史部分的第四卷不可或缺。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特别交代:“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9-445.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603.

③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

④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J].中国社会科学,2015(1):4-22,202.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1.

来。”^①据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所呈现内容的顺序(先理论后历史)不同,马克思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学说相关内容的“描述”与“揭露”在前^②,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改造”和新的理论的“建构”,彻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得以构建起来,理论叙述才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试图用“描述”“揭露”“改造”“建构”来概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环节。

(一)描述与揭露:发掘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以往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理论学说的“描述”与“揭露”占据了全书的很大篇幅,《资本论》第四卷则是集中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描述”与“揭露”的详细记录。为了阐明“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③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对以往众多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详实摘录——这些摘录中既包含同一个人对同一问题相互矛盾的论述(如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两种见解),也包含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甚至看法截然相悖的论述(如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见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的论述)。这些摘录一方面为马克思准确地“描述”他们的理论学说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又为其所作的“描述”的客观性提供了佐证和注解。在准确而客观地“描述”以往政治经济学学家们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并“揭露”这些理论学说本身的矛盾与不足,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所作的又一项重要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对某一政治经济学家的某一理论的“描述”与“揭露”是立足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史来进行的,因此,这种“描述”与“揭露”展示为一种“历史的评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明确说:“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④换言之,马克思所进行的这种“描述”与“揭露”,一方面在于展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则致力发掘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⑤,由此必然会产生种种理论谬误。因此,只有在这一“历史路标”的指引下,即只有从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出发、从剩余价值本身出发,政治经济学规律才能得到彻底而科学的阐述。

(二)改造与建构:在“历史路标”的指引下构建新理论

通过“描述”与“揭露”来发掘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对阐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前面已经指出,对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来说,构建出一种彻底的因而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其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改造的重要环节,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即构建一种彻底的理论以推动“原本”之改造。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彻底的理论是如何构建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给出了某种提示或回答,即这种彻底的理论的构建,要在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学说“描述”与“揭露”所发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的指引下进行。从《资本论》第四卷所展示的内容看,构建这种彻底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具体环节:一是在“描述”与“揭露”所发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的指引下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改造”。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理论。这里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为例来进行说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形成源于他对以往政治经济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②马克思在1877年11月3日致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这里所说的“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即《资本论》第四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5.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

学家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改造”。具体而言,“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①,在李嘉图看来,产品的价值等于该产品的平均价格,即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之和,地租是农产品的价格超过其价值的余额,但是这个余额同其所谓的一般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在每一个生产领域内部,属于这个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个别价值,而是决定于商品在该领域一般生产条件下所具有的价值”,但是受到供需状况影响,“在价格由于需求超过供给而上涨以前,追加的需求不可能按原来供给状况下的价格,由追加的供给来满足”,因此“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农产品“有价格超过剩余价值的余额”,然而这只是由于超过供给的需求所引起的“追加的供给”,即由“较好土地的产品价格上涨到高于其价值”,换言之,李嘉图的这种“地租”中只有“级差地租”而没有“绝对地租”^②。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改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剩余价值的角度来阐明地租的本质,将地租理解为剩余价值的转换了的特殊形式;二是基于土地所有(私有)权的客观事实阐明了绝对地租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关于地租问题的讨论置于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当中,“建构”出了自己全新的地租理论,并以理论叙述的方式将其集中呈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当中。

总之,通过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家相关理论学说的“描述”与“揭露”来发掘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历史路标”,并在其指引下通过对原有理论进行“改造”和新理论的“建构”,马克思彻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得以构建出来。作为集中展示这一理论体系的著作,《资本论》不仅被马克思本人视为自己的“主要著作”^③,而且被列宁视为“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④。同时,这一著作还因其承载的内容而被人们形象地视作“工人阶级的圣经”“社会主义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圣经”^⑤。这一理论通过掌握群众而参与人类历史进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而且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特质得以彰显,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使命得以实现。

四、结 语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指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⑥。我们之所以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除了因为它是马克思理论探索活动所展示出的客观事实之外,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使马克思的理论活动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重要载体,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⑦。就马克思自身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奏,又是这种研究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因此,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从中汲取智慧。

[责任编辑:伍 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8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79.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8.

④列宁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⑤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00.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6.

⑦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4-9.